

# 杜甫研究三十年

——以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为中心的讨论

吴中胜

〔摘要〕 伴随着改革的春风，1981年《草堂》（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）创刊号出世了。三十年来，和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，杜甫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，而作为杜甫研究的专业性期刊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为此起到了推助器的重要作用，成为学者们从事研究工作的精神家园，是杜甫研究者交流信息、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。我们以本刊为中心，从版本文献、生平交游考辨、思想研究、艺术形式研究、文体研究、地域研究、批评史接受史研究、学术队伍培养、跟进学术信息等方面讨论三十年来杜甫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《杜甫研究学刊》所起的推助作用。

〔关键词〕 杜甫研究 三十年 杜甫研究学刊

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（原名《草堂》）1981年元月创刊，这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拂中国古老大地的时候，“风乍起，吹绿一池春水”，春风浩荡，万物更新。可以说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的办刊史，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。三十年来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，我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步入繁荣昌盛的新阶段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，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地，杜甫研究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《草堂》一开始为半年刊，1988年起改为季刊，并

由“草堂”更名为“杜甫研究学刊”，更加明确了刊物的专业性质和所具有的学术性，每期刊约十余万字，如今已出第100期，也就是说，三十年来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发表了杜甫研究的文章1000多万字。我们从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这一个窗口，就可以见出这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状况。

作为学术研究，新时期的杜甫研究始于对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的批评。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从一开始就呼吸到学术春天的气息，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列。1980年12月3日冯至访问杜甫草堂，他说：“建国以来，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但是仅仅用现实主义

作者：吴中胜，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后，341000

评价杜甫是不够的。我们要破除迷信，大胆探索。郭沫若同志那本《李白与杜甫》是十年浩劫中唯一大量发行的书。作为科学院的院长，写出这样不科学的作品，我很为他惋惜……”<sup>1</sup>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秀熟说：“解放以来，很长时间都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研究杜甫的，因而对杜诗中描绘自然的作品，尚未提到哲理的高度来研究。郭老那本书，一般人都认为对杜甫的评价是公正的，离科学的态度更远。今后对这本书应作出恰当的批评。”<sup>④</sup>成都杜甫研究学会会长缪钺说：“在‘四害’横行时，杜甫备受冤枉。郭老那本书造成的对杜甫看法的思想混乱是不可低估的。因此，进一步深入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，学会今后要勉力为之。”<sup>(四)</sup>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从一开始就和整个社会“拨乱反正”的思潮是合拍的，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并及时纠正极左思潮对杜甫研究造成的危害，在拨乱反正中寻找杜甫研究的新突破，以杜甫研究为龙头，从而带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从“危机”走向繁荣。

冯至在《草堂》创刊号的祝辞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：“历代伟大的诗人都是诗的领域的开拓者。战国时代的屈原、唐代的李白、杜甫，他们都丰富了诗的内容，发展了诗的形式，扩大了诗的疆土。研究这样伟大的诗人，不可能是有止境的，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。建国三十年来，研究杜甫，虽然经受了十年浩劫中的摧残与诋毁，成绩是很显著的，但也有不足的地方。杜甫忧国忧民、感慨身世，是他作品的主要内容，有些研究著作对此进行比较深入的阐述，是十分必要的。可是杜甫的哲学思想、他对于自然界无广不及、无微不至的观察，对于儒家、道家和佛教的态度，对于绘画、音乐、舞蹈的美

学观点等方面，我们都注意得很不够，这不能不说是显著成绩中的一点缺陷。现在专门研究杜甫的刊物《草堂》即将问世，我在衷心祝贺的同时，希望在这刊物里我们的视野能开扩得更宽广一些，探讨问题更深入一些。发现一些前人不曾看到的事物。”<sup>1/4</sup>冯至在三十年前，精辟地概括了建国三十年来杜甫研究的成绩、不足和成因，而他所说的不足，正是近三十年来，杜甫研究理应努力的方向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，后人在这些方面有所开拓有所进取吗？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这三十年来，杜甫研究在版本文献、生平交游考辨、思想内容研究、艺术美学研究、杜甫其他文体研究、综合研究、地域研究、接受史、批评史研究、人才队伍培养、对外交流与信息报道等方面都取得许多成绩。我们以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为中心来扫描一下这些成绩。

### 一、版本文献、生平交游考辨

文献资料是研究的基础，这方面杜甫研究者比较注意收集整理。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华文轩编的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·杜甫卷》(唐宋之部)，宋代后的资料没有下文。这套书直到今天仍然是杜甫研究者的必备书目，20世纪80年代的杜甫研究论著基本上要从本书征引资料。近三十年来的杜诗版本文献的收集整理突飞猛进。1986年同时出版了两本杜甫研究的目录学著作。一本是山东大学郑庆笃先生撰写的《杜集书目提要》(齐鲁书社版)，介绍清以前知见书215种，近代知见书140种，存目书221种，计576种。另一本是杭州大学周采泉先生编撰的《杜集书录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版)，收知见书448种，存目书220种，计668种。这两本为杜甫研究提供基本线索的著作，极

大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杜甫研究。

除了杜诗书目，杜甫研究文献整理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。有几部著作值得一提。首先是张忠纲著《杜甫诗话六种校注》（齐鲁书社版）。本书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，集有宋代方深道辑《诸家老杜诗评》宋代蔡梦弼集录《杜工部草堂诗话》清代刘凤诰撰《杜工部诗话》清代潘德舆撰《养一斋李杜诗话》蒋瑞藻辑《续杜工部诗话》和张忠纲自己编注《新编渔洋杜诗话》。另附有清代翁方纲《王文简古诗平仄论》张忠纲撰《渔洋论杜》（原载《文学评论》1987年第4期）一文。每部诗话前有一段说明，理清本诗话的作者、出版年月、版本流传、主要内容。第二本是张忠纲、綦维、孙微著《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》（齐鲁书社版）。本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：（一）杜甫对前人主要是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；（二）杜甫在山东的行迹交游考辨，分泰山之游、兖州之游、任城之游、单父之游和齐南之游；（三）自唐以迄清末，杜甫其人其诗对山东的影响概述；（四）自唐以迄清末，历代山东学者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概况，特别提出卢世澹《杜诗胥钞》和别具一格的杜诗评注本赵星海的《杜解传薪》这是杜诗学史上鲜有人注意的。至于王渔洋的杜诗学等放在特定的地域文献视角来考察，也别有创获。（五）杜诗在山东流传、刊刻、整理情况的研究。本书从地域角度来清理有关杜甫的研究资料，从方法角度上也是重要贡献。第三本是宋开玉著《杜诗释地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）。据本书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内容包括：杜甫生前游历过的地区的地名和名胜古迹；杜甫没有游历但在诗歌中吟咏到的地名和名胜古迹；后人为杜甫而建的纪念性名胜。著名学者张忠纲

作序评此书云：“体例完备，考辨详实，吸收最新成果，纠谬辨误，颇多创获，较阎若璩《四书释地》规模大矣，其功伟矣！”本书修正了近年杜诗地名研究中的错误之处。对杜诗地名详释，不仅促进了对杜甫游历行踪的了解，也促进了对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。第四本是孙微著《清代杜诗学文献考》（凤凰出版社版）。清代是继宋代以后杜诗研究的第二个高峰，有关文献盛况空前。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对清代杜诗学文献的整理情况作全面梳理，包括清代杜诗学书目的重新厘定、杜诗学文献著者生平的详细考订等方面。通过广泛的查阅、考订，初步理清清代杜诗文献的一个总体框架。收录存佚清代杜诗学文献达410余种，按时代顺序分为四卷，每卷又按存佚情况分别编排。第五本是蔡锦芳著《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》（上海大学出版社版）。本书分上下两编。上编是关于杜甫诗歌版本及注家方面的研究，澄清了杜诗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问。如中华书局影印郭知达的《新刊校订集注杜诗》，与原宋本之间有多大的出入；神秘的杜修可、杜定功、杜立之等是何许人也；吴若本与《钱注杜诗》的关系；朱鹤龄《辑注杜工部集》研究；杨伦的《杜诗镜铨》是否存在以蒋金式的批朱本为底本的嫌疑。下编是关于杜甫诗歌作品的专题研究。

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一直以来都特别关注杜甫研究文献资料的研究动态和收集整理。上述专著的有关成果，如孙微、蔡锦芳的有关研究成果，有的在学刊发表，有的发了书评。如郝润华、伍国权撰《杜甫诗话的集成性整理——评〈杜甫诗话六种校注〉》（2004年2期）<sup>1/2</sup>，认为张著从取材的详赡、校勘的精审、辑佚的完备、体制的严密等方面，都达到了很高的

水平。《草堂》从 1981 年的创刊号到 1984 年的第 1 期连续刊发了杜甫纪念馆供稿《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》共有 7 期。还刊发了赵维融撰《清人论杜资料辑录》(1985 年第 2 期)、丁浩撰《杜甫草堂藏元刻杜集评介》(1989 年第 4 期)、《杜甫草堂藏明刻杜集评介》(1990 年第 3 期)、胡可先撰《唐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》(1990 年第 4 期)、《杜诗史料论纲》(1997 年第 2 期)、赵海菱撰《杜诗在元代的研究与整理》(2008 年第 2 期) 这些文章重视杜甫文献的收集、整理、编目、考释, 为以后的杜甫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作。

作家的生平交游也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一环。关于杜甫生平交游研究, 2008 年第 2、3 期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发表了沈文凡、孟祥娟撰写的长篇综述文章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杜甫生平研究述论——兼评〈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〉》, 对近三十年的杜甫生平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性评述, 同时对陈冠明、孙慷婷著《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版) 进行评价, 对相关研究的著作称引评议已详, 此不赘述。我们这里只想指出的是, 《杜甫研究学刊》一直也很关注杜甫生平交游研究的动态, 先后发表过不少关于杜甫生平交游方面的论文, 如卞孝萱、黄志洪、乔长阜撰《杜甫与高适、岑参》(1981 年第 2 期、1983 年第 1 期)、郁贤皓撰《李杜交游新考》(1983 年第 1 期)、陶敏撰《杜甫交游新考》(1987 年第 2 期)、张忠纲撰《论严杜交谊与杜甫去蜀》(1987 年第 2 期)、胡可先《杜甫交游补考二则》(1988 年第 1 期)、丘良任撰《杜甫之死及生卒年考辨》(1988 年第 2 期)、陶敏撰《杜甫交游续考》(1989 年第 2 期)、王辉斌撰《任华与杜甫交游考索》(1989 年第 2 期)、王辉斌撰《杜甫

卒年新考》(1989 年第 4 期)、沈元林撰《论杜甫与房琯》(1990 年第 2 期)、尹占华撰《漫说杜甫与高适的关系》(1990 年第 3 期)、张志烈撰《杜甫与刘允济》(1993 年第 4 期)、张志烈、张晓蕾撰《杜甫与韦僊》(1994 年第 2 期)、王辉斌撰《杜甫母系问题辨说》(1994 年第 2 期)、日本铃木修次撰《岑参与杜甫》(1998 年第 2 期)、邝健行撰《杜甫、高适、李白梁宋之游疑为开元二十五、二十六年说》(2001 年第 2 期)、何焱林《杜甫享年考》(2003 年第 4 期)、(日本) 上田武撰《杜甫在东鲁时期与李白的交友与诗作》(2004 年第 1 期)、周睿撰《杜甫舍弟行踪考略》(2004 年第 1 期) 等, 这些文章所涉内容广泛, 对杜甫的生卒时、地与享年、卒因、墓葬、父系、母系、妻室、兄弟、子女、交游、行踪等进行了考辨与分析, 许多文章提出的问题尽管有待学界进一步考量, 但实实在在地为研究杜甫打开了新的视野, 可喜可贺。随着学术研究向前推进, 不断有新史料的挖掘和发现, 相信会有更多更扎实的成果出现。如胡可先撰《新出土〈郑虔墓志〉考论——兼及郑虔与杜甫的关系》(2008 年第 1 期), 就是据新出土的《郑虔墓志》这一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, 为杜甫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。

要说杜甫研究文献资料整理方面的不足, 就是到现在为止,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《杜甫全集校注》还没有出来。<sup>4</sup> 这有待今后杜甫研究工作者的继续努力。据莫砺锋先生说, 由山东大学承担的《杜甫全集校注》正在编纂过程中,<sup>5</sup> 我们希望此书早点面世, 以嘉惠于杜诗学界。

## 二、杜甫思想研究

冯至说: “对于杜甫忧国忧民的诗歌,

早已引起后人的重视。但是，对于杜甫描绘自然的诗歌却往往被忽略了。其实他的这些诗歌含有很深的哲理。”<sup>〔4〕</sup>冯至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杜甫研究的不足。三十年过去了，这种研究状况有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呢？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不仅有改观，而且是大大地改观。关于杜诗思想内容方面的研究，不仅注意到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情怀，而且还广泛地开展了对他的哲学思想、美学思想、社会思想、文化思想、伦理思想、心理思想，当然也有文学思想的研究。这些方面，近三十年来的杜甫研究有较大的开拓。

20世纪50、60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，学者们常常从阶级性、人民性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。到80年代初，这种思想观念仍有遗存。《草堂》创刊号刊发谭文兴《杜甫为什么描写劳动人民的疾苦》，还是本着人民性、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杜诗，认为：“既要看到杜甫描写人民生活疾苦的可贵，这一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其极为重要的地位，但是也要看到他描写人民疾苦的政治目的，即指出他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。”八十年代初，极左的思想在中国社会还有相当的势力，阶级斗争的观念在有些人的头脑中还根深蒂固，这篇文章就是这一思想在杜甫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。直到1988年“杜甫在湖湘”讨论会上仍有学者用“人民性”的视角去审视杜诗。（见刘洪仁撰《人民性的光辉总结——也谈杜甫湖湘诗的主调》1989年第1期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社会思想的进步并不是一个直线运动的过程，有时甚至有反复、有曲折。

对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，后人多有共识。近三十年来，也有不少这类文章，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再探讨。康伊撰《杜

甫君臣观新探讨》（1986年第2期）认为谈杜甫的君臣观，必须重视唐代历史，特别是唐代政治思想史这一基本背景。杜甫处理君关系的指导原则，并不是“忠臣”思想，而是以唐太宗与魏征那种相契关系为标准的“良臣观”。章润瑞撰《杜甫“一饭不忘君”试析》（1991年第3期）是一篇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文章。文章认为，杜甫的“忠君”思想是与其“忧患意识”而俱来的，是一个自觉的生成过程。他对皇帝的“忧危”、“讽刺”、“谏诤”，也是其忧国忧民忧君的正面表现。文章认为，“对于封建时代人物的评价，不能以抽象的‘忠君’‘造反’与否为标准。”陶瑞芝《论杜甫的爱国主义》（1994年第1期）一文首先区分国家与祖国两个概念，在这个原则基础上，作者认为“杜甫是位不同寻常的爱国诗人。”张忠纲《忧国忧民无已时——杜甫爱国思想琐谈》（1995年第3期）重申忠君与爱国是“很难截然分开的”，“在杜甫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，他的忠君是和爱国、忧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。”杜甫的忠君，实质是爱国爱民。沈荣森《从“三吏三别”看杜甫的忠君思想》（2001年第4期）从具体作品的分析得出结论，认为杜甫虽未能摆脱忠君观念的束缚，但他用诗歌直言不讳地指责君王的错误，具有鲜明的“非君”意识，并不象一般文人那样愚忠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。

对于杜甫的仁者伦理和和谐思想的研究，也是三十年来渐趋增多的话题。邓小军《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》（1990年第4期）、《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》（1991年第4期），认为杜甫从忧患一生艰苦奋斗，和整幅儒家的心灵历程，是中唐儒学复兴运

动的先声。杜甫对原始儒家人性思想中人性本善、人性普遍平等、天道人性本质一致等核心观念，有深刻的体认与表现，并作出了实践的发展。论者把杜甫放在中国思想史的视野中审视其特点和贡献，这是两篇视野开阔又有理论深度的论文。戴武军《论杜甫仁性伦理思想》（1993年第4期），认为“杜甫的‘仁’是一种既悠远阔大又执着现实的博爱和至善精神，是一种个体本然生命与社会、历史的趋同意识，是个体人格与社会伦理状态同一的结晶，也是那种‘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同一’的使命感和生命自足感。”韩成武《论杜甫的众生平等意识》（2000年第2期）认为杜甫呼唤众生的生存权和被尊重权。如果此说成立，那么是否可以说，杜甫就具有初步的人权观了？这个问题有待商榷。我们认为，不能用现代人权的观念简单地套用古典诗文，其中许多概念的具体内涵是要具体分析。莫砺锋《论杜甫的文化意义》（2000年第4期）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角度来体认杜甫“仁”的思想，他说：“杜甫以其人生实践使儒家关于‘仁’的概念更为丰富，更为切实可行，也就是使‘仁’的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都有得到加强。”祁和晖《杜甫人本境界论》（2000年第3期、2002年第3期）着力分析杜甫的人本思想，认为以人为本是杜诗的基本主题，“杜诗成为诗史，杜甫成为诗圣的根本原因就在其以人为本精神。写人与人生，尊重人与人生。爱惜生命，仁民爱物。”张栋栋《弘扬杜甫人格的当代意义》（2003年第3期）认为，当代社会世风日下，弘扬以杜甫人格为代表的传统人格有重要意义。赵静《杜甫的圣性与人性——以杜甫的早期排律为例》（2003年第4期），从杜甫的早期排律中，发现一些杜甫并不为人

称道的真实人格，以期对其人其诗有更全面的了解。从生成发展的过程性来探讨杜甫人格，这是本文很有意义的思想。周建军《从夔州物候民俗诗看杜甫之“仁”》（2005年第1期）从杜甫晚年物候民俗诗的细致分析体会杜甫博大的仁者情怀。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，如何弘扬中华和谐文化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成为当代学人的共同使命。以此为时代背景，“弘扬杜甫精神，建设和谐社会”成为杜甫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的主题。《杜甫研究学刊》近年连续刊发了一系列论文，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。这些文章是刘新生《以人为本人尽其才——诗圣杜甫的和谐社会观》（2007年第2期）、杨胜宽《从杜甫咏怀诗看他的社会和谐理想》（2007年第3期）、陈昌渠《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——杜甫儒家政治理念解读》（同上）、钟树梁《纪念杜甫要切实弘扬杜甫精神并努力构建和谐社会》（同上）、韩成武《杜甫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研究》（2007年第4期）、张志烈《杜甫精神与传统和谐理念》（2008年第1期）等，这些文章着力探讨杜甫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，有较强的现实意义。这也证明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始终紧跟时代步伐，把握时代发展脉搏，也说明各位杜甫研究专家始终心系社会，与时俱进，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学术品格。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刊发了钟树梁、张志烈、吴明贤、祁和晖、刘友竹等先生的悼念诗文，这本身就是杜甫的仁爱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再现。

谈杜甫的爱国忧民和仁者思想，主要都是围绕其主导思想——儒家思想来展开的。除了儒家正统思想之外，杜甫还受过其他思想的浸染吗？这是贯于求新思变的

学者们思考的一个话题。首先是杜甫与佛教的关系。早在1983年钟来茵就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,其《论杜甫与佛教》(1983年第2期)认为,杜甫生活的时代风尚佛学浓厚和他的家庭环境有佛学渊源,杜诗内容也有佛教因素,作为外国文学的佛经对杜诗有一定影响。刘怀荣《试论杜甫的佛教信仰》(1989年第1期)认为,杜甫与佛教的关系表现出一个由远而近,由一般到逐渐密切的过程。他不乏学佛的愿望和决心,他的佛学信仰却只是杂而不专、泛而不深。这就跳出了传统学术单从儒家思想来审视杜甫的贯有理路,看到了杜甫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赵玉娟《从杜甫的诗看杜甫与佛教之关系》(1993年第4期)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杜甫与佛教的因缘。卢燕平《杜诗禅思之轨迹》(2000年第2期),分开元年间和飘泊西南两个时期,对杜诗禅思轨迹作了分析。邓绍秋《“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”——论杜甫晚年诗的禅宗意趣》(2003年第3期)认为杜甫晚年诗蕴涵着禅宗意趣,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:禅宗历史意趣;禅宗哲理意趣;禅宗审美意趣。研究晚年杜甫诗的禅宗意趣,有利于把握唐代以来文人“儒禅互补”的文化心态。朱学东《杜甫诗论与佛禅宗风》(2004年第3期)从一些概念的对应关系探讨杜甫诗论所受佛禅宗风的影响,并诠释杜甫的诗学理论。至于杜甫与道家、道教的关系,萧涤非《杜甫研究》冯至《杜甫传》和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等都有所涉及,新时期则是更进一步的推究。丁浩、周维扬《道家思想与杜甫成都诗作》(1992年第2期)认为,杜甫成都时期的诗作,在题材上田园化,思想内容上恬淡化,风格上清新化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头脑中的道家思想造成

的。徐希平《杜甫与道家及道教关系再探讨——兼与钟来茵先生商榷》(1999年第2期),钟文《再论杜甫与道教》(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》1995年第3期)一文自称“就郭先生全部论据作驳论”,意在否认杜甫有道家思想。而徐文则进行一再商榷,认为杜甫的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家正统观念,同时还受到包括释、道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深刻影响,其中道教及道家的一些观念意识在其思想深处长期存在。其影响是消极与积极兼备,但更多的偏于积极良好一面。之后,徐希平连续撰文阐述这一思想。其《杜甫〈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画太乙天尊图文〉试解》(2000年第1期)则解读杜甫具体作品的道家思想。另一文章《李杜思想与创作受道教文化影响之表现及其意义》(2007年第2期)对道教影响李杜思想和创作的不同特点作了具体分析。无论是谈杜甫的佛教思想还是谈其道家、道教思想,学者们都是在肯定其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提出问题,看到了杜甫思想的丰富性,走出了思维单一性的框框,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路。

除了以上对儒道释等带根本性的哲学思想的探讨外,新时期关于杜甫思想的研究是广泛而深入的,由上述根本性思想延申至诸多具体艺术领域。如有不少学者探讨杜甫的绘画思想,成松柳《杜甫题画诗及其审美观》(1985年第2期)、何根海《杜甫题画诗绘画美学思想刍探》(1991年第4期)、李祥林《画骨·传神·写真——杜甫的绘画美学形神观》(1992年第4期)、文自成《杜诗色彩美窥隅》(1995年第2期)、周瑾《杜甫题画诗的法与意》(1996年第4期)、金启华《杜诗题画诗笺释》(2006年第4期)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。对于杜甫的音乐思

想,张金海《〈同谷七歌〉的音乐美》(1985年第2期)、朱舟《杜甫与音乐》(1995年第2期)、刘亚男《论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》(2008年第4期),就是这方面的开拓性尝试。在书法方面,黎孟德《书贵瘦硬方通神——论杜甫与书法》(1993年第3期)、张巍《公孙大娘剑器舞张旭草书杜诗——杜甫与盛唐艺术》(2004年第2期)、金启华《杜甫论书法诗笺释》(2005年第2期)是很有见解的文章。杜甫不仅在创作上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,在诗学理论上,杜甫也有许多独到见解。像杜甫这样创作和理论并举的作家,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少有的。因此,对杜甫的诗学思想的探讨,更是众多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点。吴调公《转益多师是汝师——读杜甫〈戏为六绝句〉札记》(1982年第1期)、周振甫《杜甫诗论》(1984年第1期)、万云骏《略谈杜甫的诗论》(1988年第2期)、康伊《论少陵诗学的基本理论结构》(1990年第2期)、周兴陆《杜甫诗论的诗学史定位》(2005年第3期)等文章,是在这方面的力作。对于杜甫的美学思想,《草堂》创刊号发表屈守元《杜甫美学观琐谈》就是这方面研究的绝好开场。我们知道,杜甫在诗歌里对于绘画、书法、音乐、舞蹈诸种艺术都有所反映,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他的美学思想。屈先生从杜甫的诗歌本身出发,拈出四点来谈:1、碧海掣鲸(《戏为六绝句》其四);2、瘦硬通神(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);3、角鼓悲壮(《阁夜》);4、佳句惊人(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)。从杜诗本身出发来归纳他的美学思想,观

点令人信服。而王启兴《杜甫入峡诗中所表现的自然美》(1984年第2期)、王启兴《杜甫美学观三题》(1988年第2期)、王飞《论杜甫的艺术审美倾向》(1994年第3期)、张国伟《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》(1995年第1期)、姚菲《杜甫山水诗崇高美管窥》(1995年第3期)、翟正业《艺术丑与杜甫的写丑》(2002年第2期)、程洁《杜诗美学异质论》(2002年第4期)、祁和晖《杜诗三大独特诗美论》(2003年第3期)等文章,是对于杜甫美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掘进。限于篇幅,以上文章我们不一一作具体分析。(未完,待续)

(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《杜甫批评史》(08JC751007)的阶段性成果。)

注释:

1. 〇. 濮禾章《记冯至先生访问成都草堂》,《草堂》创刊号。
- ¼ 冯至《祝〈草堂〉创刊并致一点希望》,《草堂》1981年创刊号。
- ½ 除特别说明外,本文提到的有关文章均出自《杜甫研究学刊》。
- ¾ 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秦亮点校的《杜甫全集》,正如编者自己所言,这实际上是依清人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排印而成,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《杜甫全集》。
- ⑧ 莫砺锋《杜甫诗歌讲演录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。

责任编辑 刘晓凤